

就应该是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我们所看到的事实是，1992年的英镑贬值并未使英国经济有任何优于美国的表现。而墨西哥经济与比索的运行轨迹似乎在告诉我们：汇率与其说是经济活动的原因，不如说是结果更为恰当。

尽管货币贬值常常造成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并不一定导致经济增长。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随着韩元的急剧下跌，韩国的消费物价指数暴涨，但直到物价指数开始下降时GDP的增长才有所改善。人们并不是见到通货膨胀就会多花钱，只有当他们相信价格上涨预示着经济景气时才会增加支出。在韩国，贬值引发的通货膨胀没能刺激消费和增长，因为人们不相信经济会在短期内恢复繁荣。

在中国，人民币贬值未必能把经济拉出通货紧缩的陷阱。支持人民币贬值的论点如下：

弱势人民币—更昂贵的进口商品—国内物价上涨。

概念上，这个逻辑可以成立。但从数量上估计，小幅的贬值，比如说10%，对拉高国内价格起不到什么作用。1998年中国的进口总值达到1400亿美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4.4%，减掉加工贸易之后，进口依存度降到4.5%，与之相比，美国和日本的这一比例分别为7%和10%。加工贸易的进口品不在国内消费，而是重新出口，因此对国内价格没有影响。

另一个被广泛接受的观点——弱势货币有利于出口，恐怕也经不起实证的检验。由于其它亚洲货币纷纷贬值而显得强势的人民币并没有明显地削弱中国的出口竞争力。1997年和1998年，中国在美国、日本的市场份额都在继续扩大，1999年上半年仅有微小的下调。基于同样的理由，人民币贬值不会对促进中国出口有显著作用。

人民币对日元和欧洲货币近来的弱势减少了人民币贬值的政治压力

综上所述，我们预期中国将采取一种更加灵活的汇率政策，如同央行官员1999年初所暗示的那样。

（作者系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研究部主任）

转型中的中美关系

牛军

自70年代中美和解以来，两国关系的基本特征就是一直处于转型的过程中。这里所谓的“转型”，是指推动中美关系发展的主要动力以及双方关系中的主要内容一直在转变。揭示推动中美关系动力的变化和这种变化赋予中美关系的一些重要特征，有助于理解今后一个时期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势。

中美关系是近50年来的国际关系中极其特殊的双边关系。这首先是因两国除了都是“超大型”国家外，难以找到其它重要的共同之处，如：社会发展阶段不同、历史文化背景迥异、体制难以衔接、国家实力对比悬殊、意识形态对立，等等。

其次是因为，自1972年毛泽东与尼克松打开中美和解的大门以来，两国关系经历了独特的发展过程：先是为了对付共同威胁而形成了没有内在要求的战略合作关系；然后在战略合作过程中，逐步产生出发展双边关系的内在动力；再然后开始在新的基础上追求战略伙伴关系。在这个过程中，中美关系实际上完成了两次重要的转型。

第一次转型是从1972年至冷战结束。以往的研究充分地证明，70年代初促使中美从对抗走向和解的主要因素，是对付苏联扩张和结束印度支那战争的共同利益。^[1]在从和解到正常化的过程中，中美之间形成了一种“外力推动型”的关系，即双方改善关系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对付共同面临的外部威胁的需要。不过其中有两个问题被忽略了，而后来发展证明，它们的影响的确是长期的，有时还是颇大的。

其一是关于安全战略关系的作用和局限性。中国领导人在70年代初决定与美国和解，主要是基于安全战略的考虑，对美政策的调整与国内的极左政策是背道而驰的。美国领导人同样将安全战略放在首要位置，他们甚至没有考虑，中美关系是否存在不受战略关系支配的内在价值。事实表明，共同的战略利益只是促成了中美关系的缓和，而中美关系的正常化是与美国决定改革开放联系在一起，在时间上也是完全同步的。

与此相关的第二个问题是，中美走向和解时，各自社会内部的支持力量非常薄弱，所以双方都需要采取措施来塑造对方的好形象，以便使对方在本国公众中至少是可以被接受的。这样做的结果与中美合作必然产生的巨大震动结合在一起，造成了不切实际的幻想和对对方过高的期望，并使人们误以为，只要有安全战略方面的共同利益，就足以使中美关系万古长青。这种心理状态的承重力相当脆弱，在中美关系逆转时则起到强化误解和敌意的作用。时至今日，这种不健全的心理状态还在影响对中美关系的理解。

第二次转型开始于冷战结束,延续至今。冷战结束给中美关系带来的最大冲击,就是摧毁了支撑中美关系的战略基础,中美关系一度像是失去罗盘的航船,在惊涛骇浪中随波逐流。两国当时面临的问题是,当战略关系这个遮饰物突然被揭去后,双边关系中的问题立刻凸现于眼前,并成为决定中美关系前途的关键因素。中美关系能否正常发展,取决于双方能否在战略合作被严重削弱,解决好双边关系中暴露出来的分歧,并同时为中美关系重铸新的基础。

如果作一粗略的划分,当时中美双边关系中主要有三类问题。第一类包括台湾、西藏等涉及中国主权与领土的问题,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台湾问题,它曾经导致中美关系在1995年夏季大幅倒退,并使双方在1996年春发生军事对峙。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警世性的,即中美之间仍然有发生战争的可能。第二类是当时以人权问题为焦点的意识形态冲突,它一直严重制约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在深层次上影响着中美关系的各个方面。第三类是经济贸易方面的摩擦,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知识产权问题,它曾经几次将中美推到贸易战的边缘。由于基础受到严重削弱,解决上述双边关系中的问题,确实是对双方的真正考验。

1997年秋两国领导人共同提出建立“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这表明中美关系终于走出谷底。中美首脑互访取得的成果,不论从形式上还是从实质上,都超出了人们的预想,其重大意义首先在于确认了中美关系赖以维系和发展的新基础。这个新基础是以互利的经济贸易关系为核心、以贸易和安全方面的合作为支柱的,尽管它看上去还不够坚实,但承重力之强是空前的。在此基础上,不仅双边关系中的主要冲突得到解决或缓解,两国的战略关系也得以继续并有所加强。更重要的是,中美关系从单纯的“外力”(应付共同面临的外部威胁)驱动型转变为“内力”(产生于各自主要的国内政策的合作愿望)和“外力”(在全球和地区安全事务上的合作需要)的双向驱动型。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阶段中美关系的进步是有其特殊条件的,而且这些条件实际上也是理解今后一个时期中美关系变化的重要线索。

第一个条件是,两国决策层都表现出希望发展关系的愿望,这种愿望产生于中美各自主要的国内政策。克林顿政府上台伊始,即将振兴美国经济作为国策。与此同时,中国正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的鞭策下,争取经济再上新的台阶,以确保完成本世纪(20世纪)使国民经济总产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发展互利的经济贸易合作关系的共同愿望,成为中美两国决策层决心改善双边关系的主要动力。1996年以后,争取在安全领域保持和扩大合作的努力,则加强了中美关系改善的势头。

毋庸讳言,中美社会内部发展双方关系的推动力的强弱是不同的。中国社会中发展中美关系的愿望超过了美国方面,它包括了发展与美国的经济贸易关系、学习美国先进的科学技术、了解和学习美国的文化,甚至在政治改革中学习美国民主政治的某些经验。总之,美国一直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参照系。美国方面则更多地考虑贸易和安全领域的需要,其发展关系的内在需求不如中国那么强劲。

第二个条件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与之相适应的对外政策不出现根本性的逆转和美国不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如果没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国家发展战略,没有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推动,冷战结束后中国争取与美国保持建设性的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同样,如果美国持续不断地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例如不是像1994年那样将人权问题从对华政策的中心位置挪开,或者不是像1996年以后那样,在台湾问题上回到遵守对“一个中国原则”的承诺,中美保持建设性的关系也是不可能的。从当前的情况看,美国不断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是主要问题。

二

当前中美关系正在向一个新的阶段发展。与前一阶段主要是处理双边关系中的问题相比,共同面对和处理重大的国际事务以及就当今国际秩序中的重大原则进行对话和争论,将在中美关系中占越来越大的比重。

例如曾经导致中美关系倒退的直接原因,是美国飞机袭击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但这次剧烈的冲撞毋宁说是一段时期以来双方矛盾的大爆发,它的背后反映出中美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的重大分歧,例如美英不顾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表决结果,空袭伊拉克;美国在违背有关国际协议的情况下,增加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美国扩大美日军事同盟的覆盖范围,不肯就这个同盟不染指台湾问题的解决明确作出承诺;北约撇开联合国,对主权国家南斯拉夫进行军事打击,并企图以此为契机,对至关重要的国家关系准则进行实质性的修改,等等。可以预期,有关这些涉及当今国际体系基本原则的争论还会持续下去,这是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

冷战结束近十年来,与中美双边关系全面发展同时,两国在当今世界上的地位也在发生变化。一方面,美国作为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其综合国力不仅仍然是鹤立鸡群,而且在各个领域里继续保持强劲地上升的势头,美国人也继续对充当世界领袖干劲十足,在世界上到处干涉。

另一方面,中国随着自己综合国力的迅速提高,对国际事务表现出越来越积极的关注,施加影响的领域越来越广泛。这既是基于一个大国的责任感,也是中国自身利益的迅速扩展使然,在许多问题上,中国已经很难再采取回避的态度。共同建立“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正是对这一历史趋势的前瞻性反应,它代表的当然是一种积极合作的愿望。

在这种变化的背景下,中美将会直接面对决定双方关系的最深层的问题,即中国是否下定决心,义无反顾地以建设性的姿态,最终融入现存的国际体系,尽管它的许多重要规则是有利于并变得更加有利于发达国家的,而且美国在其中占据领导地位;以及美国是否下定决心,真心诚意地不阻挠中国这个正在崛起的非西方大国融入现存国际体系,这意味着美国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必须调整其态度和立场。

总而言之,美国要领导世界,它必须面对并接受中国融入现存国际体系所必然带来的变化;崛起的中国要融入世界,也必须冷静地思考和应付美国的政策带来的各种问题和麻烦。正是从

这个意义上说,中美恰恰在此世纪之交时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达成协议,对中美关系的发展堪称历史性的事件。

三

冷战结束后,中美关系一度被描述为处于“十字路口”。中美都曾认真地审视双方的关系,力图给两国关系作出合乎本国利益的定位。当时中国政府提出了“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十六字方针,美国政府则提出了“全面接触”的对华政策。^[6]正是在这两项政策相互磨合的过程中,也是经历了波峰浪谷间的颠簸折磨之后,两国领导人才逐步挖掘和积累起共识,并终于在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上达成共识,提出中美共同努力建立“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6]

中美是当今世界上两个“超大型”国家^[6],它们的关系涉及广泛的领域,其中不可能不涉及全球和地区性的问题;在涉及全球和地区性的问题上,不可能没有合作,甚至可以说在主要的方面是合作,尽管在一些问题上也存在着重大的分歧,否则中美关系绝不可能是今天这种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反映了中美关系的部分现实,当然它更多地是反映了两国希望看到的发展方向。

5月8日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中美关系一度急剧恶化,事态的发展显然导致中美双方对“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的怀疑,对中美关系发展前景的预期明显降低。在这种背景下,为了理解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有必要进一步研究中美关系在转型过程中已经形成的一些基本特征。概括地说,这些特征包括了“重要”、“全面”、“复杂”和“具有渗透性”等四个方面。

“重要”是指中美关系涉及到两国重大的战略利益,而且对全球和地区的国际政治形势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正是这种双重的重要性,促使两国必须谨慎地处理双方之间的关系,而且在外部力量的严重牵制和影响下,双方实际上也不可能完全自行其是。

“全面”是指中美关系涉及到双方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安全等各个领域,以及政府的各个部门和各地区。这种状况决定了双方对对方的政策越来越多地受到各自国内不同的部门利益、地区利益和集团利益等等的的影响,很难在各个领域里表现出整齐划一的态度,也很难在某一个领域里保持始终如一的态度。

“复杂”是指中美之间已经形成了内容和范围都越来越广泛的利害关系结构,不同层次上的利害关系日趋复杂,利与害并存,冲突与妥协并存,竞争与合作并存。“敌”或“友”、“竞争对手”或“合作伙伴”等等范畴,都不足以概括中美关系的现状,而且很有可能在今后一个时期里也是如此。

“渗透性”是指中美关系已经渗透到双方各自的社会生活之中,对两国的国内政治均形成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多方面的。很难说对对方的某一种看法在两国内部会具有多么重大的普遍意义,或者一个时期甚嚣尘上的呼声就一定一成不变地张扬下去。进一步说,双方都有可能通过影响对方社会内部的形势来影响对方的政策。

冷战后,中美关系经常面临麻烦和危机,也正是在不断克服种种困难和障碍的过程中,两国关系逐步得到改善。这种看上去是相当矛盾的现象,正是由上述特征造成的。它们的存在决定了中美关系的发展既不会出现以往那种大悲大喜的戏剧性变化,也肯定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在这种状况下,要在新的阶段中维持和改善中美关系,至少有两个条件是不可缺少的。

第一,中美有必要巩固和发展业已存在的有利于稳定双方关系的框架。这个框架包括对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达成的共识,以及为实现共同的目标而建立的制度化交往机制。两国领导人可以在这个框架下,确保对中美关系有效的领导、管理和控制。中美关系并不是可以自动调节和改善的,对那些短视的、受情绪支配的、或为暂时的国内政治利益而损害两国关系的做法放任自流,将造成动荡,甚至酿成大祸。

第二,采取有效的措施增加相互间的信任,是至关重要的。当前制约中美合作,甚至有可能将中美导向对抗的深层原因,是彼此对对方战略意图持有深刻的疑虑,而且中美各自国内对对方的不信任明显增高,只不过程度和原因是完全不同的。

从中国方面来说,对美国的疑虑的确是长期存在的,所谓“疑虑”就是怀疑美国的战略意图,对中美关系的状况感到把握不定,对中美关系将如何发展深感忧虑。^[6]无须否认这种疑虑产生于多方面的原因,不过总的看来,主要还是对一个时期以来美国处理国际事务(特别是与中国有关的国际事务)的态度和行为的一种反应。同样,中国公众中的反美情绪总的说来是针对某些具体问题的,没有什么特别深刻的社会根基。

美国方面的情况则严重得多。美国国内有关“中国威胁论”的种种议论表明,美国对中国的崛起存在着极其深刻的疑虑,即怀疑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能否继续,对中国的战略意图和未来的对外政策感到担忧,担心中国的崛起将挑战美国的优势地位。这种疑虑反映在行为上,则表现为越来越多的针对中国的戒备和防范措施。例如美国一面鼓励或怂恿它在欧洲或亚洲的盟友加强军备,一面却对中国增加部署每一枚导弹神经过敏。这很难说是正常的心态。

美国的非正常心态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复合体,其中包括了文化上的优越感、优势地位带来的傲慢、种族上潜在的排他意识、与非西方大国正常交往的经验欠缺、意识形态的对立等等。这些因素从根本上影响着部分美国人对中国这样一个非西方大国崛起的基本态度和思考,使他们难以合理地对待中国的一些基本利益和基本感情。^[6]而相互尊重对方的基本利益和基本感情,是类似中美这样的大国交往中不可或缺。显然,要消除美国的疑虑和防止这种疑虑演变成错误的政策,需要作出更多的努力。

苏联解体后,美国曾经视统一后的德国和经济迅速发展的日本为威胁。不过德日与美国的同盟纽带和对美国的依附关系,终于使美国化解了对它们的疑虑。在中美关系中不存在这类条件,双方只能在解决矛盾和冲突的过程中,逐步摸索出能够稳定中美关系的框架。目前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不论是摸索过程还是那种框架本身,都将是史无前例的。

注释:

[1] 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过程可参阅宫力著:《跨越鸿沟:1969—1979年中美关系的演变》,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

[2] 贾庆国主编:《棘手的合作:中美关系的现状与前瞻》,32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谢希德、倪世雄主编:《曲折的历程——中美建交20年》,8—9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牛军主编:《克林顿治下的美国》,4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

[3] 《中美联合声明》,1997年10月29日,参阅《努力建立中美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4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

[4] 关于“超大型”国家的概念可参阅《棘手的合作:中美关系的现状与前瞻》,246页。

[5] 牛军:《疑虑:评析中国人对中美关系的战略思考》,载《太平洋学报》,1998年,第4期。

[6] 时殷弘、石斌:《美国与21世纪世界政治的根本问题》,载《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3期。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接触与开放:架起中美相互理解的桥梁

——从美国几次制订核打击计划谈起

姜长斌 刘建飞

在50年代的两次台湾海峡危机中,中美在军事上尖锐对峙,以至于美国决策层曾多次考虑并计划对中国使用核武器。如果美国的计划变为现实,其后果不堪设想,中美关系和世界形势绝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所幸的是,对抗双方都保持了应有的克制,悲剧没有发生。回过头来看,当时对抗升级的根本原因是两国决策层相互间缺乏应有的沟通和接触,对对方的政策目标和背景不够了解。以后,由于两国有了一定程度的接触和了解,对抗没有再度升级为直接的军事对峙。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使中美两国人民和政府有了更多的机会相互了解,进而使两国关系发展前途有了根本改观。冷战后,中美关系地位上升,两国间的矛盾也凸显出来。但是两国间仍然存在很多共同利益。如何构建两国关系新的框架,不使双方矛盾激化、对抗重起,是摆在两国政府和政治家以及关心两国关系发展前途的人民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可以得出结论:对美国来说,正确的选择是接触而不是遏制;对中国来说,对外开放仍是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针对中美之间存在许多分歧和矛盾的现实,党的十五大特别提出了“坚持对话,不搞对抗”的方针,为发展中美关系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一、对中美对抗极限状态的反思

50—60年代的中美对抗,是中美关系史上最沉重的一页,也是最值得研究和总结经验教训的一段历史。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与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合作研究的项目“50年代以来的中美关系”,使我们在占有美国最新解密档案材料的基础上,重新透视并反思这段不寻常的历史。

中美之间的对抗、冲突,除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这两次直接和间接的热战外,当属1954—1955年和1958年两次台湾海峡危机期间的尖锐军事对峙。两次台海危机不仅使中美对抗达到极限状态,濒于正面战争的边缘,而且美国决策层在两次危机中都曾考虑对中国使用核武器。^[1]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历史系罗伯特·阿克辛利教授指出:“在两次事件中,以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和国务卿约翰·杜勒斯为首的共和党政府的高级官员们决定,美国不会对中共在台湾海峡的挑战保持中立,如果局势确实需要,他们准备采取军事干预,在可能的情况下使用核武器,以保护国民党政府对沿海岛屿的占领。”^[2]第一次台海危机期间,在1954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两次炮击金门、11月攻击国民党军队盘踞的位于浙江沿海的大陈岛、1955年1月攻克一江山岛后,美国政府一方面急切呼吁联合国“斡旋”,以停止中国沿海的战斗;另一方面对中国进行战争威胁。“1955年2—3月间,艾森豪威尔等人明白无误地宣称正考虑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以“遏制看起来特别难以驾驭的北京”。而且在事件发生前,1954年8月,艾森豪威尔就考虑过:“共产党的舰队可能是原子弹攻击的一个好目标”。^[3]第二次台海危机时,还在事件爆发前,8月15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美军根据需要帮助国民党保卫他们的沿海领土免受有成效的封锁或重大袭击。这两种可能性无论出现哪一种,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计划都要求使用战术核武器,除了深入打击中国内地的军事目标之外,首先打击金门附近的机场,并且如果共产党不妥协就向北打到上海。”^[4]在1958年8月23日中国人民